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6.03.002

# 从技术赋能到权力重构:数字资本积累的创新样态、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张 恂

(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数字技术体系的新特质,使数字资本积累呈现出不同于产业资本积累的新样态: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时空“解绑”,数字资本积累从生产领域全方位入侵日常生活领域;基于“面向用户”的平台吸纳战略,数字资本家对其主导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进行了组织重塑;基于智能算法开展心理规训,数字资本的“控制-积累”策略不断隐秘化。但是,数字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依然处于马克思资本观的解释框架:数字资本积累所呈现的技术创新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数字资本积累的隐秘实质依然是“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数字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是“数字后备军”的壮大与多样化。随着数字资本积累不断发展,数字资本家必将获得“赢家通吃”的垄断霸权,而创造“数据财富”的数字劳动者则日渐式微,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同步深化的历史趋势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呈现。有鉴于此,应辩证把握数字资本二重性,正视数字资本作为新质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以市场机制充分释放数字资本促进生产力的活力因子。同时,要深刻认识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逐利本性,构建全链条的数字资本治理体系,防范数字资本运行垄断化、权力化等无序扩张倾向,这是规范并引导数字资本助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中国式数字文明的重要依循。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资本积累;平台战略;数据垄断;资本权力;数字文明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数字平台这一新型生产组织形式的兴起,主导资本形态从马克思当年面对的“产业资本”嬗变到今日的“数字资本”,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从“实体性生存”转向“虚拟化生存”<sup>[1]</sup>的深刻变革。从蒸汽时代到数字时代的历史时空坐标转换,催生出了新的“时代之间”,呼唤马克思资本观的当代出场。马克思资本观对资产阶级资本观的超越之处在于,其穿透了资本“物”的表征,揭示了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资本支配和剥削劳动。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统治劳动这一不平等的生产关系是在

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得到实现、强化与再生产的。因此,基于对资本本质科学判断而开展的资本积累分析构成了马克思资本观的核心内容,关涉对资本内在结构及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科学认识,对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并未发生“质变”,数字资本积累新样态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中,且数字资本积累的发展必将使数字资本的垄断霸权不断壮大,造成数字经济时代新的贫富分化。因此,基于马克思

引用本文:张恂.从技术赋能到权力重构:数字资本积累的创新样态、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3):12-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3YJC710124)

作者简介:张恂(1992—),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E-mail:zhangxun9208@yeah.net

资本观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揭示技术革命迭代下的数字资本积累新样态,探析数字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阐明数字资本积累的现实后果,以确证并捍卫马克思资本观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解释力和话语权。

## 一、从产业资本积累到数字资本积累: 数字革命赋能下的资本积累新样态

在马克思资本观的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sup>[2]</sup>,而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必然要适应生产力发展,也只有这样,资本积累才能持续进行,因此,生产力革命深刻影响着资本积累的模式及样态。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的技术迭代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形态嬗变,必然会引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新变化。沿着这一分析逻辑,以产业资本积累为参照,结合数字经济新特质,考察数字资本积累的特殊性。

### 1. 从场域受限到时空的数字化“解绑”:数字资本积累场域从生产到生活的扩张

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积累场域受到时空有限性的明显约束。在产业资本主导的生产场景中,生产场所的实体性与固定性对劳动时长构成了物理限制,劳动时间与劳动空间紧密“绑定”。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劳动主要依靠实体性生产资料,而实体性要素又主要集聚在以现代工厂为代表的固定的物理空间内,这意味着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时间要在工厂内从事生产,其劳动时长实际上面临着空间约束。因此,现代工厂制在助力产业资本实现各类生产要素时空集聚的同时,也将产业资本积累的主要场域限定在“工厂内”。

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实体化生产场景,数字技术体系的全新特质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虚拟化“变形”,赋能数字资本积累场域的时空“解绑”。其一,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数据要素是一种非物质性资源,其虚拟泛在、高度流动的存在样态会促使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场景逐渐从“线下”物理空间转向“线上”虚拟空间,突破了实体性生产场所对资本积累规模的物理限制。其二,随着生产场景的虚拟化转型,资本家积极建构的各类数字平

台跃升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工厂”。这些“云工厂”的运行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时空场景,而是依托数字技术体系的强渗透性广泛接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拓展了数字资本积累的时空边界。其三,不受时空限制的“数据流”成了数字资本组织生产过程、推进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所谓“数据流”,是资本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将数字劳动者与数字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数据化,以实现人、事、流程的“云端”存续与移动互联。这样一来,数字资本家就能通过线上数字指令,随时随地向身处不同时空场景的数字劳动者分配生产任务,这种即时同步、不拘地点的生产组织形式,实质上加深了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程度,从时空双重维度扩张了资本积累场域。

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时空“解绑”,数字资本积累逐渐从生产领域扩张至生活领域,不断模糊并消解生产与生活、工作与闲暇、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边界。受技术条件所限,产业资本积累无法吸纳劳动者的全部时间,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的一切数字化活动则日益具有生产性<sup>[3]</sup>。在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下,不限时间和空间的“全天候”劳动成为现实,数字劳动时间已由固定工作日时长延伸至闲暇时间,数字劳动空间则从特定工作场所扩展到私人住宅、公共场合乃至各类交通工具,数字资本积累不断侵占个体生活时间。Hardt 等认为:“在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主义下,工作日和生产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划分越来越不明显。”<sup>[4]</sup>此外,由于大众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被各类数字平台所中介化,因而只要人们接入并使用平台,就在为数字资本积累生产数据原料。可见,数字资本积累谋求将一切非生产时间转化为生产时间,进而实现劳动者时间的普遍资本化。相应地,数字资本积累场域从“工厂内”扩张至“生活中”,越过生产领域而全方位入侵社会生活领域。

### 2. 从排他性占有到“面向用户”的平台吸纳:数字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组织重塑

在马克思看来,扩大再生产是资本积累的基本特征和必然手段。产业资本主导下的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追加购买的方式,不断将新的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流通领域吸纳至生产领域。然而,这种传统方式赖以运行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以资本排他性占有劳动条件为中心,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使用主导而非拥有主导”<sup>[5]</sup>的全新特质。不同于传统生产资料的有限性与竞用性,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石油”的数据,不仅能以超低成本甚或零成本被无限复制并使用,还具有“越用越多”的要素禀赋,这意味着数据必须基于海量的分享与使用的方式投入生产过程,才能获取巨大价值。迈尔-舍恩伯格等指出:“大部分的数据价值在于它的使用,而不是占有本身。”<sup>[6]</sup>可见,数据的社会化使用过程是一个天然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这种基于开放共享的再生产过程与工业经济时代相对封闭的生产组织形式难以兼容,必然要求进行相应的组织重塑。于是,作为新型网络组织形式的数字平台历史性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能,其不仅能够高效收集并处理海量数据,还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sup>[7]</sup>,能很好地适应数据要素社会化生产与使用的新特质,成为数字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关键组织形式和中介。

随着“工厂”到“平台”的生产组织形式嬗变,数字资本积极推行“面向用户”的平台战略,以求将数字劳动力及数据资源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整合纳入平台运行模式。首先,平台以“开放共享”为“诱饵”,吸纳海量个体成为平台用户。不同于产业资本对生产基础设施的排他性占用,数字资本不仅为用户提供自由访问平台的便利,还向用户免费开放特定的平台数据资源和数字服务,从而不断吸引人们注册使用平台,将所有接入平台的主体全都转化为“用户”。其次,利用数字平台的超强集成性塑造“用户黏度”,使用户难以脱离平台秩序。依托数字技术,平台实现了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服务中介的“云端”集成,不仅以网络化方式广泛链接起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诸环节<sup>[8]</sup>,更深度介入社会日常生活的各领域。因此,人们“数字化生存”需求的实现高度依赖于数字平台,基于平台生态的各类 App 应用已充斥大众的工作与生活。这表明,数字平台确立了一种架构社会生产、生活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使每个用户都难以逃离平台<sup>[9]</sup>。最后,平

台运行内蕴的资本逻辑使用户异化为“产消一体”的数字劳动者。用户在访问平台过程中留下的“数字足迹”及在消费平台数据产品时产生的新数据,都作为“数据流”被后台无偿吸纳。通过对这些“数据流”的深度分析与再加工,平台能精准定位用户偏好,从而生产更多新的衍生数据产品以“俘获”更多的目标受众。作为“消费者”的用户,实际上还是平台数据和内容的生产者<sup>[10]</sup>,只要平台用户“在线”,就会源源不断地为平台及其背后的数字资本运转提供数据原料。此外,由于平台强大的网络效应与数据“越用越多”的特殊禀赋,平台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势必会使平台所获数据原料呈现指数级增长,而平台数据资源的增多,又会进一步提高用户黏度并吸纳更多新用户,如此循环运转,在平台网络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数字资本积累规模的“闭环”。

综上,资本将数字平台这一关键性生产组织设施面向用户开放使用,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资本积累战略。借由平台吸纳用户这一方式,数字资本较为隐秘地将数字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纳入资本积累过程,进而通过用户的“在线”活动源源不断获取海量数据原料。相较于产业资本需要以货币手段不断买进原料的扩大再生产方式,数字资本已能够通过平台内部“造血”,满足对部分追加劳动力和数据原料的需求。

### 3. 从物理强制到基于算法的心理规训:数字资本“控制-积累”策略的隐秘化

使劳动者适应延长劳动时间或提升实际劳动强度,既是高效控制劳动过程的现实问题,更是关乎资本积累持续推进的关键。产业资本的“控制-积累”策略主要是基于机器体系的显性肉体规训,即根据机器体系运转流程拆解劳动过程,以保证劳动者严格按照特定“工序”进行连续机械化劳动,这种策略具有鲜明的物理强制性。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机器使资本的“控制-积累”策略发生新变化。从技术本质看,算法是“逻辑+控制”<sup>[11]</sup>的集合体,这里的逻辑是算法内置的特定运算规则和程序,赋予算法控制数据处理过程的“权力”,其本身又是被人为设定的。这样一来,资本只需隐置于算法之后,通过设定或更改运算



规则和程序,就能操控数字劳动过程。更重要的是,凭借算法的智能分析和深度学习等能力,数字资本还能锁定并理解劳动者的心理偏好和思维习惯,进而使数字劳动者“陷入一种从心理上更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剥削的状态”<sup>[12]</sup>。相较于产业资本对劳动者身体的物理强制,掌控智能算法的数字资本深入劳动者心理层面开展“柔性”的劳动规训,这一转变在以下常见的数字劳动场景中均有体现:

一是在专业型数字劳动场景中,数字资本家利用算法“投其所好”地为雇员设计了一系列颇具“弹性”的工作方案,诱使雇员陷入自我施压的“过劳”处境。如今,“人性化管理”“灵活上下班”“居家办公”“线上协作”等新型工作形式似乎使专业数字劳工获得了一定的“劳动自由”,让其从心理上感到“被理解”“被尊重”“能自主”。然而,这不过是数字资本裹挟算法精心设计的“自由陷阱”:一方面,数字资本利用智能算法随时随地分派和更新劳动任务,并基于后台算法实时监控数字劳动过程,这实际上是在“数字劳动自由”的遮蔽下无限扩展数字劳动的时空边界,以最大限度吸纳数字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基于算法设计的“弹性”工作机制依然是“结果导向”的,专业型数字劳工只有完成算法设定的工作流程才能获得相应的目标奖励,为保证工作强度与算法的算力及运行节奏相“适配”,其往往会“主动”自我加压。正因如此,很多互联网企业的雇员常常“自愿”利用闲暇时间完成工作任务甚至“主动加班”,劳动强度不减反增。

二是在“零工经济”劳动场景中,“自我施压”现象更为严重。相较于专业数字劳工,数字零工与平台的契约关系更为松散,其劳动过程没有监管者“在场”,劳动时间亦可自主决定。数字资本利用算法分析机制精准捕获数字零工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及“多劳多得”的心理偏好,以算法推荐机制向其提供多套“个性化”竞争性奖励机制,“诱导”甚或“倒逼”其开展自我时间规训。以网约车行业为例,后台算法设计了“时间导向”的收入流水机制和竞争性奖励机制,司机们只有完成一定的服务时长或在平台限定时间内完成“冲单”任务,才能保证其

日常流水或奖励达到预期水平。这意味着,网约车司机不得不“拿时间换流水”,从而陷入自我工作加压的集体焦虑中<sup>[13]</sup>。

三是在无酬数字劳动场景中,海量用户深陷数字资本裹挟算法所建构的“信息茧房”,为平台提供“免费劳动”<sup>[14]</sup>。由于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了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飞跃,掌控算法的数字资本可以根据用户偏好设计并生产特定的数字内容,通过所谓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不断“喂养”平台用户。由此,平台用户陷入了算法设定的“信息茧房”,他们不断围绕“被定制”的数字内容进行搜索、浏览、分享、点赞、评论及再创作,这些在线活动所产生的所有“数字足迹”最终被数字资本无偿占有,平台用户也异化为“产消一体”的免费数字劳工。由于上述“在线活动”是融入用户日常生活的社交娱乐行为而非冰冷机器压迫下的机械劳动,因此用户不知不觉且“乐在其中”地参与数字资本的积累过程。

## 二、数字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 基于马克思资本观的解释框架

尽管数字资本积累新样态是马克思当年未曾面对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资本观在数字时代的“失语”与“失效”。这是因为,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并未改变,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依然对数字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具有强大解释力。

### 1. 数字资本积累的技术创新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逻辑共契

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并通过资本有机构成这一范畴集中考察两者的互动关系。在马克思资本观看来,为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不断进行积累,而生产水平的提高则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仅意味着资本用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不变部分”比重提高、用于购买劳动力“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还意味着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的科学技术与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不断提高。因此,资本积累增长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相伴而生的。随着资本积累增长,每

个劳动力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不断增加,科学技术也越来越与劳动者分离,并逐渐成为一种外在力量反过来统治劳动者。马克思在分析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跃迁时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sup>[15]418</sup>

数字资本积累的新样态离不开数字技术“赋能”,这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数字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由不断提高的数字技术水平决定的:一方面,用于购建和建设数字劳动资料及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变资本在数字资本总额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无论是以大数据、云技术、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工具,还是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都在数字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围绕相关软硬件系统的开发、建设、维护、运营进行大量投资。以研发投入为例,《2025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入记分牌》显示,全球 R&D 经费支出前三强企业均为 ICT 领域的巨头,分别是亚马逊(65 318 百万欧元)、谷歌母公司 Alphabet(46 131 百万欧元)、脸书母公司 Meta(41 986 百万欧元),而苹果、英特尔、三星电子等数字巨头的研发经费支出也位列全球前 20 强。另一方面,用于雇佣数字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数字资本总额中的占比相对降低。由于作为虚拟资源的数据产品可以被无限复制,其传输、存储等可通过网络通道和“云端”完成而无需大量劳动力,因此,数字企业在数据产品的复制、传输、存储等环节投入的边际劳动成本几乎为零<sup>[16]</sup>。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数字技术体系日趋智能化,海量数据的整理、挖掘、提炼等复杂工作只需少量高专业技术人员即可完成,且新兴的人工智能机器本身还能独立胜任一部分对认知能力要求较高的非重复性劳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产业资本时代,数字劳动力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大幅增加。这种因数字资本追逐生产智能化而导致可变资本价值占比相对降低的现象,印证了马克思的科学判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sup>[17]236</sup>

总之,作为一种具有浓厚技术色彩的资本

形态,数字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规模不断扩大,并加快了数字资本积累进程。随着数字资本积累的技术创新,用于购买、开发、建设、应用数字技术体系的不变资本投入越来越高,资本化的数字技术体系越来越与数字劳动者分离,且数字资本对雇佣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不断减少。

2. 数字资本积累的隐秘实质依然是劳资不平等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资本观超越资产阶级资本观的思想硬核在于:将资本的本质锚定于“生产关系”而非“物”<sup>[17]922</sup>。资本积累的发展并不单纯是资本总额增大这一“量”的层面的变化,更是资本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资本关系”指向独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支配并剥削失去劳动条件的劳动者的不平等关系,这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sup>[18]</sup>。以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积累,利用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吸纳到资本关系中,不断固化并再生产“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sup>[15]821-822</sup> 尽管数字资本积累呈现出一些马克思当年不曾面对的新样态,但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及增殖本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数字资本积累依然围绕“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这一“轴心”,不断再生产数字资本支配数字劳动的不平等关系。

首先,数字资本积累的不断发展加剧了劳动主体与核心数字生产资料的分离。“核心数字生产资料”是指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有关键架构性的生产资料。其中,智能算法是数字技术体系的“灵魂”,其内部架构和运算机制被数字资本家掌握<sup>[19]</sup>,普通劳动主体根本无法触及,而数字平台这一新型“云工厂”的搭建者及所有者也是资本家。算法和平台具有极强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数字资本积累的发展会使资本家对核心数字生产资料的占有呈现“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与此相应的则是数字劳动者越来越远离数字技术体系的核心,且数字劳动力的实现将越来越依赖数字资本及其掌

控的关键性生产资料。

其次,数字资本积累推动了以各数字平台相互嵌套、关联为表征的生产组织规模扩大,进而催生“泛劳动化”<sup>[20]</sup>现象,实现了资本关系的极大“扩容”。工业时代的资本关系主要涉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但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资本家采取了“平台吸纳”战略,其掌控的各类数字平台逐渐构成了一个将生产、生活卷入其中的庞大“平台生态圈”,使大众难以从中抽离,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数字劳动群体由此生成。在数字资本构筑的“平台生态圈”中,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数字资本积累所需的劳动力突破了契约关系的束缚,扩展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海量平台用户。

最后,数字资本积累是“死劳动”不断吮吸“活劳动”的过程。通过加大对数字机器、数字平台等“不变部分”的研发、运行及维护投入,也就是将数字技术体系资本化的过程,资本家不断将数字劳动者吸纳到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将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转变为数字技术体系中的“活的附件”。在生产过程中,数字资本的“不变部分”只有通过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将自身价值转移到数据产品上。由于核心数字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独占,无论是雇佣数字劳动者还是非雇佣数字劳动者,要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就必须依附数字资本家开展对象化活动,且随着数字资本积累规模的增大,数字资本以其“不变部分”所能吸纳的“活劳动”不断增多。

3. 数字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是“数字后备军”的壮大与多样化

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资本积累规模的增大,劳动力供给超过资本的增殖需要,一支游离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且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不断生成并壮大。“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sup>[15]742</sup>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sup>[15]728</sup>,因为产业后备军“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

从资本的摆布。”<sup>[15]733</sup>产业后备军既是资本积累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维持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在数字资本积累的生产关系本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数字技术的新特质使马克思当年论及的“产业后备军”在数字经济时代演变成一种新型的“数字后备军”。

在数字资本积累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数字技术体系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应用加速了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壮大了“数字后备军”队伍。产业资本操控的传统机器体系主要是将工人劳动分解为局部的机械化劳动,数字资本操控的数字技术体系则使劳动过程趋向“智能化”。其一,许多传统生产部门纷纷完成“智能化”升级,智能机器人、智能机械臂等“全智能”生产设备的“上岗”及越来越多“无人工厂”的运行,极大改变了“人比机器多”的状况,由此产生的大量结构性失业人口被推向数字后备军行列。其二,新兴数字企业的用工结构越来越趋向“少而精”,即只雇佣并保留少量涉及核心技术业务的高专业性数字劳动者,并尽可能减少非必要的中低技能数字劳动者及体力劳动者。随着数字机器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家对高专业性数字劳工的需求也在不断减少。其三,在零工劳动场景中,愈发智能化、人性化、便捷化的各类移动终端设备大大降低了劳动过程对劳动者自身专业技能水平及其与岗位匹配度的要求。这意味着,零工经济的整体参与门槛大大降低,“知识工人”与“非知识工人”的专业化差异在零工劳动场域中正在被逐渐消解。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要总体呈下降趋势,如有研究表明: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经济兴起,美国的就业人数已从21世纪之始的峰值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sup>[21]182</sup>。

### 三、数字资本积累的现实后果:数字资本垄断霸权的壮大与贫富分化的加剧

根据马克思资本观的分析脉络,为抵消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损失,无限逐利的资本必将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利润总量,并在“资本吸引资本”<sup>[15]722</sup>的资本集中过程中走向垄断。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助力下,数字



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规模呈指数级倍增,数字资本逐渐发展为数字垄断资本,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

数字资本家对数字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为其获得垄断霸权提供了根本前提。首先,数字资本家通过加大对“不变部分”的投入,实现了对核心数字技术的垄断性占有,包括垄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超大规模分布式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这些以算法为中介架构的核心技术涉及数据资源的收集、清洗、提炼、应用等关键性环节,是数字资本家的“不传之秘”,普通用户根本无法触及其技术内核。其次,凭借技术上的垄断性优势,数字资本家不断加强对数字平台的建设和控制,打造了基于“平台生态圈”的垄断共同体。数字寡头垄断的数字平台已遍布数据生产与“数字化生存”的各个方面,并积极推动不同类型数字平台之间的相互嵌套与融合升级,使其掌控的各数字平台以网络化途径达成垄断利益勾连。最后,基于对核心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的垄断,数字资本家获得了一个独享的封闭“数据池”。隐匿于“后台”的数字资本家无偿地将平台用户留下的数字足迹吸纳到封闭数据池,其既没有向用户支付酬劳,也没有将这些数据资源共享到公共网络空间,而是将这些无偿获得的海量数据资源进一步加工为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衍生数据产品,并以收取垄断租金的方式将这些衍生数据产品提供给生产方或销售方用以生产经营决策,同时以“个性化推送”的方式垄断用户的数据获取和传播渠道,由此实现了对供需双方的“赢家通吃”。

随着数字资本独享的封闭“数据池”不断扩容,数字资本的垄断霸权日益壮大,而创造“数据财富”的数字劳动者则日渐式微,数字经济时代新的贫富分化由此形成。一方面,数字资本家在大力推行“面向用户”的平台吸纳战略过程中,不断“诱导”或“软强制”平台用户给予数据使用授权,以扩容“数据池”。由于数据资源“越用越多”的特殊禀赋及数字平台强大的网络效应,平台吸纳的新用户越多,就意味着数字资本所能使用的用户数据也越多,且资本家在使用用户数据的过程中还能不断获得新的

数据资源,数字资本积累过程呈现“赢家通吃”的特征。这种“赢家通吃”的垄断霸权可通过各数字资本巨头所占市场份额得到直接说明,如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市场所占份额高达90%,亚马逊占据全球在线零售平台近40%的市场份额,全球社交媒体2/3的市场份额则被脸书占据。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垄断霸权的强化加深了数字劳动者对数字资本的依附和从属。这是因为,数字垄断资本对数据产品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强势操控、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普遍架构,使微观主体越来越难以脱离由数字资本积累内在逻辑所构筑的新秩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通个体如若脱离各类大型平台将难以实现“数字化生存”,但只要个体作为“用户”接入数字资本垄断的各类平台,就将持续不断地、无偿地为维系并强化数字资本垄断霸权提供“原料”。

数据生产的社会化与数字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数据财富”日益集中到大资本家手中,而创造“数据财富”的数字劳动者则沦为数字贫困阶级,被迫加入“数字后备军”行列。这种新型贫富分化表现为: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等数字资本巨头的市值位列全球企业前10,其中苹果、微软的市值在2010—2020年的增长超过7倍<sup>[22]</sup>。而自20世纪80年代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经济兴起以来,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收入份额却均呈下降之势,其中美国的劳动力收入份额“从67%下降到47%,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2000年之后发生的”<sup>[21]183</sup>。近年来,各大数字资本巨头追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加剧了“去劳动化”之势,在全球范围内影响3亿个工作岗位<sup>[23]</sup>。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社会化的数字生产力逐渐表现为“数字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整个数字劳动者群体的生产力。随着数字资本积累的不断发展,数字生产资料越是被更多数字劳动者共同使用,就越会加速并增强数字资本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就越会使数字劳动者的共同劳动产品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而与数字资本家财富积累的指数级增幅相比,数字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幅就显得微不足道

道,这决定了生产过剩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并且由于数字资本积累的规模倍增而不断扩大。

#### 四、结论与启示: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到数字资本善治的现实审思

基于前述分析,从产业资本积累到数字资本积累的样态嬗变总体呈现出“由实转虚”的新特征,但这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实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本质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然具有理论深刻性与强大解释力,数字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后果依然处于马克思资本分析所遵循的唯物史观逻辑框架内。一是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为适应数字革命的巨变,资本力量主动谋求数字技术“赋能”以创新资本积累模式。由于数字生产资料的新特质及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的数字化、虚拟化“变形”,数字资本家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数字资本积累的场域突破了传统时空限制,从生产领域全方位入侵生活领域。与此同时,数字资本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及劳动资料的吸纳与控制转向了平台化、智能化,由此,数字资本积累实现了数字生产资料的集中与数据产品的社会化生产和使用。二是从生产关系本质看,数字资本积累对数字劳动者的支配更隐蔽、更具“柔性”,但剥削规模和强度有增无减。数字资本主导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依然是资本以其“不变部分”不断吸纳“活劳动”的过程,不仅扩大了数字劳动者与核心数字生产资料的分离程度,加深了数字劳动对数字资本的实际从属与依附,还通过数字平台广泛吸纳海量用户,实现了数字资本关系的“扩容”,并催生了一支庞大的、随时随地可供数字资本支配的“数字后备军”。数字资本家大力推行的平台战略,本质上是一种技术赋能下的“数字圈地”运动,数字平台这一新型生产组织形式成为资本家不断吸纳并重组数字生产资料和数字劳动者的“容器”。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出场的数字资本,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前10位国家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资本运行之间的关系,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是在认识层面,应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二重性的科学阐释,辩证审视数字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现实运动中表现为“物”,亦即生产要素形态,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追求剩余价值的特殊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辩证揭示了资本“文明”与“野蛮”的双重面孔,这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资本提供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sup>[24]219</sup>,强调“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sup>[24]219</sup>。因此,应从两方面把握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内在规定性。一方面,正视现阶段数字资本存在的“文明面”。数字资本是与新质生产力相联系的新型生产要素,在激励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动产业结构数字化转型、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能够助力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必须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逐利性生产关系本质并未质变,且数字技术体系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客观上又易放大数字资本的扩张本能,一旦数字资本运行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体要求,必然滑向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从而产生破坏市场秩序、形成行业垄断、加剧劳资对立等负面效应。

二是在实践层面,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放得活”与“管得住”的有机统一中,科学驾驭数字资本,即在充分释放数字资本活力的同时,有效规避其逐利行为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sup>[25]</sup>。“放得活”的实践重心是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数字资本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正面效应。为此,必须不断优化市场环境 with 政策供给,建设并完善统一开放且竞争有序的数字市场体系,深入破除数字新业态的市场准入壁垒,推动数字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鼓励数字



资本参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前沿领域,引导相关企业沿着高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变革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管得住”的实践重心则是以有效的政府治理,规范并规制数字资本运行方向,防止平台垄断和数字资本无序扩张。为此,必须健全关涉数字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特别是要建立并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监管、公平竞争审查与反垄断、从业人员权益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确保关涉数字资本的市场化改革符合社会主义导向,为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治环境。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我国数字资本运行区别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制度保障,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是科学扬弃数字资本二重性的实践要求。只有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才能规范并引导我国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数字资本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正面效应。

参考文献:

[ 1 ] 白刚. 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4):53-60.

[ 2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

[ 3 ] 包大为.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7):46-51.

[ 4 ] HARDT M, NEGRI A.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145.

[ 5 ] 张弛,张曙光. 新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J]. 学术月刊,2018,50(1):78-84.

[ 6 ] 迈尔-舍恩伯格·维克托,库克耶·肯尼斯. 大数据时代[M]. 盛杨燕,周涛,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56.

[ 7 ]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9(12):62-81.

[ 8 ] 邱海平,陈雪娇. 以平台为中心的网络组织分析——基于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视角[J]. 经济学家,2023(1):25-35.

[ 9 ] 蓝江.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 哲学研究,2018(3):26-33.

[ 10 ] RITZER G, JURGENSON 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J].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 10(1): 13-36.

[ 11 ] ZIEWITZ M. Governing algorithms: myth, mess, and methods[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16,41(1): 3-16.

[ 12 ] 肖峰. 从机器悖论到智能悖论:资本主义矛盾的当代呈现[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7):104-114.

[ 13 ] 周绍东,武天森. 个体自由与集体禁锢:网约车平台的劳资关系研究[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1,42(2):43-54.

[ 14 ] FUCHS C.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9.

[ 15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 胡莹. 论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6):136-145.

[ 17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9.

[ 19 ] 黄再胜. 数据的资本化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新特点[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6):124-135.

[ 20 ] 吴文新. 智能革命下劳动方式的变革及其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2021(10): 5-13.

[ 21 ]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托马斯·拉姆什. 数据资本时代[M]. 李晓霞,周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22 ] 盖凯程,李孟杰. 数字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的三重逻辑:主导·扩张·权力[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15(3):209-224.

[ 23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平台经济发展观察(2023年)[R/OL]. (2023-09-27)[2025-12-24].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309/t20230927\\_462941.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309/t20230927_462941.htm).

[ 24 ]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19.

[ 25 ]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24-07-19(01).

**From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o Power Reconstruction: The Innovative Forms, Internal Logic,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 ZHANG Xu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y system make the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present new forms different from industr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based on the “unbinding” of space-time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intruded into daily life from the production field; based on the “user-oriented” platform absorption strategy, digital capitalists have restructured the expanded reproduction process led by themselves; and based on intelligent algorithms for psychological disciplining, the “control – accumulation” strategy of digital capital is constantly being covert. However, the inherent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still within the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Marx’s views of capital;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the essence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remains the expanded reproduction of the opposition of the duality of capital and labor; and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the large-scale and diverse “digital reserve for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digital capitalists will inevitably gain the monopoly hegemony called “winner take all”, while digital workers who create “data wealth”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synchronous deepening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overty accumulation continues to emerg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grasp the duality of digital capital. This entails facing up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digital capital as a new quality production factor, fully releasing the vitality factor of digital capital in promoting productivity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s. Additionally, it is imperative to deeply recognize the profit-driven nature of digital capital, and construct a full-chain digital capital governance system, to preven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digital capital towards monopol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his is an important guideline for regulating and guiding digital capital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and build the Chinese digit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platform strategy; data monopoly; capital power; digital civilization